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的本体论转向与文明启示

陈佳冀

摘 要: 在全球化生态危机与文明对话的背景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正经历着从民族寓言到生态共同体的本体论转向。以乌热尔图、阿来、郭雪波、石舒清等作家的创作为中心,通过民族志书写、图腾符号转译与地理空间的建构,超越了动物作为隐喻工具的传统范式,在西方动物权利理论与东方“生命一体化”观念的对话中,构建起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本体论。研究揭示,动物叙事一方面映射出民族集体心理原型与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也通过“空间诗学”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生态批评的本土资源。该叙事实践深植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其围绕“最后一个”母题所展开的现代性反思,既是对生态危机的文学应对,亦是以民族叙事主体性介入全球生态话语的独特路径,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深刻的文明启示。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本体论转向;生命共同体;民族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I29;I0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10-0140-09

自新时期文学发轫以来,中国文学动物叙事逐步实现了从寓言工具向生命主体言说的范式转型。在全球化生态思潮与本土文化传统的共同滋养下,乌热尔图、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李传锋、赵剑平等作家率先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窠臼,构建起兼具民族特质与现代意识的叙事体系。他们的创作实践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根基,通过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深入探讨动物伦理等哲学命题,并借助动物意象的审美投射,展开对人类文明的整体性观照。此类叙事敏锐地触及现代性进程中的道德困境,以诗性智慧保留了“道德现象原本的生动性、完整性和复杂性”^[1],展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与现实批判精神。从发生学角度看,20世纪70年代国际动物解放运动及其伦理转向,为中国动物叙事提供了跨文化对话的思想资源。彼得·辛格《动物解放》所推动的伦理革命,与新时期文学对“人”的重新发现形成历史性呼应。然而,中国作家并未简单套用西方权利话语,而是着力激活深植于

民族记忆中的生态基因,实现了外来伦理观念的本土转化与美学生成。在这样的跨文化视野中,中国文学动物叙事实现了双重超越:既摆脱了传统寓言式书写的惯性,又克服了西方动物权利理论常带有的抽象化局限,最终在生命共同体的诗学建构中,达成了伦理深度与审美表达的高度统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动物叙事进一步迈向本体论层面的美学构建,这一发展趋势在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觉与艺术探索中表现得尤为显著。他们所着力塑造的动物意象谱系,不再仅仅作为生态危机的预警符号,更成为承载民族文化基因的审美载体。如蒙古草原的银狐凝聚着游牧文明的生态智慧,鄂温克密林中的驯鹿延续着狩猎文化的集体记忆,青藏高原的藏獒则化身民族精神的图腾……这类创作将动物叙事与民族文化根脉追寻紧密融合,揭示出民族心理结构与文化性格的内在肌理,“成为文学世界中一个不可轻忽的现象、一道韵味独特的景观”^[2]。在此背景下,乌热尔图、郭雪

收稿日期:2024-08-13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话语体系研究”(2022SJZD137)。

作者简介:陈佳冀,男,文学博士,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江苏无锡 214122)。

波、阿来、叶广芩、黑鹤、石舒清等作家通过风格各异的叙事实践,在深入挖掘民族心理深层结构的同时,也将对社会现实的洞察融入对“美丽中国”的多元诠释之中,形成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深层次的互文关系。总体来看,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蓬勃兴起,既是对全球生态话语的创造性回应,也是本土生态智慧在美学层面的当代转化,从而为全球生态批评贡献了一条不可忽视的中国路径。

一、理论视域:全球生态批评与民族叙事的本体论转型

动物解放思潮作为20世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思想运动,深刻重塑了人类的伦理认知,并催生了动物权利论、动物福利观与生态整体主义等多元学术范式。受此思潮滋养而兴起的动物批评,已成为文学研究领域重要的跨学科方法论^[3]。回溯其思想源流,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到笛卡尔的机械论动物观,西方哲学传统长期以来构筑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范式,将动物界定为缺乏主体性的工具性存在。“世界围绕着人类运转,万物为了人类而存在;人类身为万物之灵,其价值和地位要高于自然界的众生,当然可以支配、使用动物。”^[4]这一根深蒂固的认知范式在20世纪后期遭到根本性质疑,以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与汤姆·里根的《动物权利研究》为标志,动物伦理研究实现了从边缘到主流的范式转换。其中,辛格在功利主义框架下将道德关怀扩展至动物,里根则从“生命主体”维度赋予动物内在价值与权利,二者共同动摇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本体论根基。随后兴起的生物中心论、生态整体主义以及深层生态学等理论,进一步推动了超越个体主义的系统观与生态网络思维的形成,为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认知图式。

在文学创作领域,“动物叙事”已突破传统寓言式写作的局限,逐渐确立了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叙事范式。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贡献卓著,他们并未止步于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回应,而是深入开掘本土文化资源,最终实现了三重关键性的叙事突破。其一,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与多元论域的生成。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积极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话语框架,将叙事视野从单一的人性寓言拓展至生态伦理、生命哲学与文化诗学的多元论域。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拓展始终与对族群历史记忆、图腾信仰与生态智慧的现代转译紧密结合,彰显

出鲜明的文化自觉。其二,动物形象从符号载体到生命主体的重塑。作家们多采用“拟实型”叙事策略,使动物摆脱符号化、概念化束缚,成为具有独立生命意识与情感深度的叙事主体。例如,石舒清通过老牛临水不食的细节揭示动物对生命尊严的本能守护;乌热尔图笔下受伤公鹿的倔强眼神,则传递出超越物种的生命意志。在这些作品中,人与动物被还原为“地球上的一种生命与另一种生命的关系”^[5],从而在叙事层面实现了真正的平等。其三,非人类中心主义叙事视角的革新。通过构建“动物观人”的认知范式,少数民族作家的动物叙事开创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学实践。该实践致力于营造跨物种的对话空间,引导人类在他者生命的“凝视”中,重拾对生命共同体的敬畏与谦卑。

上述叙事突破,本质上是全球生态意识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经验相互交融的产物。在敖包祭祀所蕴含的生态敬畏、白虎图腾所承载的族群记忆、草原民族“三界和谐”的生存哲学等本土文化资源的滋养下,少数民族作家构建起一种独具东方韵味的生态书写范式。这一范式不仅标志着叙事重心从“写动物”的工具性表达转向“动物写”的主体性言说,更在本体论层面实现了一次重要跨越。其深远意义更在于,通过植根传统而又面向世界的文学探索,为理解生命共同体确立了新的认知坐标。

从历时性维度来看,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在本体论层面的现代转型,是在与深厚的中国叙事传统不断对话中逐步完成的。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动物叙事长期处于寓言式书写的主导范式之下,动物形象大多作为隐喻与象征的叙事媒介。先秦寓言中的动物常被固化为道德训诫的符号载体;《诗经》的比兴传统虽丰富了动物的文化意蕴,但直至魏晋志怪,动物叙事仍笼罩在精怪变形的神秘氛围中;唐宋传奇“有意为小说”^[6]的创作自觉,在提升叙事艺术性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动物的寓言属性;及至明清小说,即便出现如孙悟空这般生动的“文化动物”形象,其象征功能仍主要服务于社会讽喻体系,工具理性色彩浓厚。正是这一源远流长的叙事传统,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寻求叙事突围与本体论建构的反思对象和超越起点。

当代动物叙事的现代性转型,在借鉴西方生态批评与动物伦理理论的同时,更深植于本土作家的文化自觉。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将动物视为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主体,承认其享有生存和繁荣的平

等权利。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家凭借其独特的民族身份、文化记忆与在地生态智慧,为动物生命主体性的建构注入了深厚的民族精神与地域文化内涵。他们的创作通常源于“万物有灵”的宇宙观与源远流长的生态禁忌,笔下的动物形象因而超越了被动的客体地位,成为兼具精神能动性与文化叙事功能的“符号性主体”。这种融合理性思辨、悲悯情怀与生命体验的书写,一方面从伦理层面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另一方面也在美学层面确立了动物作为权利主体的叙事地位,标志着一种新型叙事伦理的诞生。总体而言,此类立足于民族文化的叙事实践,无疑是对全球生态思潮的本土回应,亦是对传统生态智慧的当代转化,为我们超越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提供了重要的美学启示。

在共时性层面上,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的主题性建构呈现出多维度交织的现代性特征。其叙事空间从早期的丛林法则拓展至生态整体主义的表达;伦理关怀也从单纯的人性省思,深化为对生命共同体的整体观照;原有的民族寓言框架,则进一步升华为具备文明对话潜力的叙事形态。这一转型在具体文本中得到了生动呈现。例如,《困豹》《最后一只白虎》等作品着力凸显动物的主体意识与生命尊严;《清水里的刀子》《放生羊》则通过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叙事方式,完成对民族心理世界的细腻叩问;而《银狐》《黑焰》等文本更使动物叙事成为连接萨满信仰、游牧文明与现代性反思的文化纽带。这些创作实践表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在借鉴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本土文化基因的自觉传承与创造性转化。此种叙事范式的转型,本质上构成对启蒙现代性的一种美学回应。当动物形象从“会说话的符号”升华为具有主体间性的叙事存在,文学便得以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在生命诗学的维度上实现对于启蒙理性的审美超越。

由此可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体系的形成,得益于新时期文学以来的持续探索,以及创作者在理论自觉与艺术实践层面对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超越。此类书写在语言风格、叙事技法、审美诉求与伦理内涵等多个维度均取得长足进步,逐步形成了多民族作家共同参与、多元互动的良好创作生态。具体而言,长篇小说如赵剑平的《困豹》、郭雪波的《银狐》、黑鹤的《黑焰》等,以宏阔的叙事视野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篇小说如邓一光的《狼行成双》、叶广芩的《黑鱼千岁》、袁玮冰的《红毛》等,则在有限篇幅中凝练出丰富的意蕴层次;短篇作品如

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次仁罗布的《放生羊》、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等,亦以精悍笔触勾勒出动物叙事的多元面向。这些作品获得鲁迅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重要奖项,显示出主流文坛对其艺术与思想价值的高度认可。总体而言,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的繁荣,不仅在拓展当代文学题材疆域与美学表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其更深层价值在于,它以深沉的生态关怀与文明反思精神,为中国生态文学开辟了一条融叙事伦理与跨文化对话于一体的成熟路径。

二、图腾符号的现代诠释： 神性动物与民族伦理重构

人类文明的发展始终与动物紧密相连,二者共同编织着生态网络的每一个环节。这一基本事实提醒我们,若忽视动物的存在维度,便难以真正理解人类自身的本质,也无法在哲学层面对“人”这一概念展开深入的建构与反思。动物问题天然地关联着“道德、政治、历史、社会、文化和环境等诸多层面”^[7],正是这种跨领域的广泛关涉,使动物批评迅速成为当代学术前沿的重要议题。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动物叙事”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旨在探讨现代性语境下文学如何通过动物的想象与书写来建构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始终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生成,并最终指向对伦理视域的扩展与深化。因此,如何人道地对待动物、如何构建完整的动物伦理以促进生命共同体的和谐,已成为当代动物书写的核心伦理诉求。要从发生学角度理解人与动物的特殊关系,需追溯其文化逻辑与生成机制。现有研究普遍关注动物叙事的原始发生与原型基质,注重在人类、动物与自然的关系框架中,探讨现代个体如何借助原始意象应对精神危机、寻求超越与救赎。可见,“动物叙事”作为一个多议题交织的领域,通过“动物表述”这一独特媒介,促使我们反向内观——对动物伦理的追问,归根结底指向的是人类伦理的内核。这一过程不仅深化了人对自身的认知,也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自我反思与批判的契机”^[8]。

从历史源流来看,动物叙事在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承载着深厚的集体记忆与生存智慧。其叙述形态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为原始的渔猎时代的动物神话,又经历农耕时代的动物寓言,一般的动物童话讲述以及各个部族间种种关于动物传说的衍生与流变,逐渐过渡

到当代动物叙事相对完备的叙述形态”^[9]。可以说,动物叙事贯穿了各民族起源、演进与发展的全过程。尽管表现形式多样,其深层结构始终体现着动物与人类、自然之间休戚与共的内在联系。在渔猎时代,动物既是生存资源,也被奉为神灵象征;进入农耕与游牧文明,动物逐渐被驯化,人与动物之间形成主仆相依的关系模式;及至工业时代,动物的工具属性进一步被强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少数民族的文化语境中,动物常以图腾形式承载着被守护的情感诉求。“图腾总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其守护者。”^[10]图腾文化作为一种古老的伦理调节机制,将保护自然、回馈自然内化为族群的集体意识,引导人们在和谐共生中汲取生存力量。动物崇拜与万物有灵的观念,早已深植于各民族的精神世界,持续塑造着他们对生命关系的本真理解。

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中,那种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情感基质与伦理诉求,依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诸多作品借助神话叙事与神秘主义意象,构建起一个贯通“人类—动物—神灵”的内在伦理框架,阿来的创作便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在《格萨尔王》中,阿来对藏族英雄史诗进行现代重述,其中的动物形象被赋予鲜明的图腾化特征。格萨尔王的坐骑江噶佩布,已超越了一般坐骑的功能性存在,成为与英雄平等共生、具有神性力量的伙伴。这一形象折射出藏族文化中深厚的生命平等观与万物有灵的思想传统。与之呼应的是《云中记》,阿来在这部作品中将动物意象置于现代灾难语境中进行伦理重构。地震后鹿群的回归,不仅隐喻生态层面的修复,更通过带有神性意蕴的动物行为,暗示自然秩序中“神灵”维度的在场。与此同时,阿来在《天火》中借助图腾的消失——如金野鸭的离去,书写生态的变迁,将其转化为自然神力隐退的隐喻,直指现代社会中人与传统神圣契约的瓦解。图腾意象由此升华为批判生态伦理困境与精神失落的文学载体。

此类叙事不仅再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符号体系,更体现出在现代性冲击下对精神根基的坚守与深刻反思。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从土家族文化视角出发,对白虎图腾进行现代诠释。其笔下的白虎既象征着自然的威能,也关联着民族制度兴衰与集体性格的塑造,从而艺术地探讨了在现代进程中传统的延续与身份认同的维系问题。当代作家通过个性化的叙事方式,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个体与原始人类在生存境遇上所具有的某种共通性,即同样

面对难以摆脱的精神困境。更进一步看,那种根植于集体无意识的情感困惑,如对历史迷局的茫然、对人性中兽性因子的不安、对命运不确定性的隐忧等,实则都源于人类对自身存在难以把握的深层焦虑。这种充满犹疑、矛盾与焦灼的内心图景,在当代民族文学动物叙事中得到了有力的表达。而其揭示方式,往往依托于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关联,通过“人情”与“兽情”的相互映照来实现。正如卡西尔所指出的,原始思维中“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 of life)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11],这种万物有灵的预设,构成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的精神底色,也为当代人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郭雪波的《银狐》中,银狐“姣干·乌妮格”作为核心意象,既延续了蒙古族传统的图腾崇拜,又融入了玄幻叙事的神秘色彩。小说在魔幻与现实的交织中,勾勒出科尔沁草原上狐与人类博弈共生的瑰丽图景。其深层线索则是对现代化进程中民族精神传统与自然信仰的执着追寻。这一主题也贯穿于人类角色的塑造之中,白尔泰通过古籍《字音·毕其格》领悟万物有灵的古老智慧;铁木洛老汉则在同银狐的周旋中最终放下仇恨,走向和解。正如杨玉梅所指出的,银狐“从自然的‘沙狐’到传统文化符号的‘银狐’,这是郭雪波个人文化理念的升级,并非简单的宗教理念宣扬,而是希望人们借此树立神圣的崇尚自然、尊重生命的古老理念”^[12]。与郭雪波充满神秘色彩的图腾化书写相比,阿来在《空山》中采取了更为日常化、历史化的叙事路径,将藏獒、鹿、鹰等动物视为“生命邻居”,其命运与村落变迁紧密交织,隐喻藏族传统生活方式与自然观在现代化冲击下的逐步瓦解。阿来以平实而饱含敬畏的笔触,呈现“万物有灵”观念在日常中的流露,以及它在现实力量面前的脆弱与韧性。这种叙事将动物伦理更深地嵌入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境遇之中,展现出另一种面向的深刻性。

这种建立在“生命一体化”观念基础上的叙事实践,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化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神之间所形成的“极其复杂的均衡系统”^[13]。该系统的内在平衡力量,正来源于“生命一体化”这一核心观念。它不仅有效调和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使人类在面对严酷自然环境时能够维持内在的安定与秩序。时至今日,这一古老而深刻的生态智慧,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少数民族对动物的认知方式与生活实践,推动他们在更广阔的生存维度中与

动物共栖共生,实现与自然的深层沟通与和谐互动。

在我国众多少数民族中,图腾文化至今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例如,鄂温克族崇拜熊与鹿,蒙古族以狼、鹿为图腾,土家族敬奉白虎,回族则与马结下深厚的情感联结。以世代生活在东北山林的鄂温克族为例,他们与鹿之间建立起超越物质依赖的精神联系。鹿不仅是重要的生计来源,更被视为沟通人、神、鬼三界的灵媒,承载着整个族群的敬畏与信仰。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动物已升华为一种精神符号与情感象征,被赋予神圣的庇佑功能,甚至被认为具备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正如列维·布留尔所言:“每个图腾都与一个明确规定的地区或空间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在这个地区中永远栖满了图腾祖先们的精灵,这被叫做‘地方亲属关系’。”^[14]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这些动物形象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圣性与超越性。许多图腾动物早已成为特定民族的文化标识,深深嵌入其集体记忆与精神谱系之中,成为民族性格与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在历史的长河中,根植于“生命一体化”观念的文化实践不断交融汇聚,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坚实的精神基石。

在鄂温克族代表作家乌热尔图的笔下,鹿意象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成为象征吉祥与神圣庇护的精神符号,凝聚着民族的情感认同与精神追求。在《鹿,我的小白鹿啊》中,乌热尔图借助“寻找”这一典型的叙事模式,构建了少年川鲁和岩桑追寻小鹿恰日卡的故事主线。他们不顾爷爷劝阻,蹚过刺骨河水,穿越原始森林,智斗棕熊,坚定地走向埃雅山。这种勇气与执着,具象化地呈现出鄂温克民族的精神气质。鄂温克人世世代代遵循森林法则,依靠自然馈赠生存。然而随着现代文明的推进,他们被迫放下猎枪,外来偷猎者的猖獗又导致生态失衡,最终陷入无猎可打的困境。乌热尔图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民族生存的现实危机,常在作品中通过猎杀驯鹿或鹿群消亡的情节进行隐喻。例如,《七岔犄角的公鹿》通过少年“我”的视角刻画了一头非凡公鹿的形象。它虽受伤却顽强不屈,凭借力量与智慧战胜狼群,其精神深深震撼并启发了“我”,成为“我”成长为真正鄂温克猎人的精神启蒙。而在《丛林幽幽》中,鹿角指引的失效,则暗喻着传统精神资源在现代性冲击下的迷失与无力。通过鹿意象的多重书写,乌热尔图再现了一个民族的生存现实,也实现了对其文化命运的深沉观照。

总体而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创作深

深扎根于“生命一体化”的哲学观念与民族伦理传统之中,这不仅体现在题材的选择上,更是一种源于文化自觉的叙事立场。作家们立足于民族本位,对古老的动物图腾神话进行现代性转化,在延续传统精神内核的同时,也赋予其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思力量,使作品展现出深厚的伦理意蕴与强烈的精神感召力。正如孙悦所言,这类作品“复返朴素热诚,在失去了神话土壤的宇宙万物之间,重温聆听到灵魂抚慰曲”^[15]。当下的民族动物叙事并不追求技巧的繁复与语言的华丽,而是以平实且富有韵律、晓畅又内含张力的笔调从容书写,却往往更能直抵人心。这种叙事风格,体现出创作者真挚的情感投入与深切的现实关怀。通过这样的叙事实践,作家们不仅重构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认知图景,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为文学如何回应生态危机、文明变迁等重大时代议题,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路径与美学参照。

三、空间诗学与地方性知识： 地理记忆中的生态隐喻

在探讨图腾符号的现代转译之后,有必要进一步审视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如何通过“空间诗学”将地理记忆转化为具有文化创造性的生态隐喻。这类叙事并非悬浮于抽象空间的文学实践,而是深深扎根于具体地理场域的文化建构。它往往将动物意象与山脉、草原、沙漠等自然景观紧密融合,使物理空间转化为承载民族记忆、生态智慧与地方性知识的精神场域,构建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空间表达体系。正如作家海勒根那所言:“血脉里流淌的游牧祖先的基因冥冥中被辽阔无边的风唤醒。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灵魂的归宿,找到了文学创作的神性和源泉。”^[16]这段话揭示出,地域空间不只是情节展开的背景依托,更是民族身份认同、伦理观念与宇宙观得以生成的叙事根基。从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呈现出清晰的代际演进与主题深化的轨迹。以李传锋、乌热尔图、赵剑平与张承志等为代表的第一代作家,通过《退役军犬》《七叉犄角的公鹿》《獭祭》《黑骏马》等作品,确立了动物叙事与地域空间深度融合的叙事范式。他们的创作为后续作家如郭雪波、石舒清、索南才让等奠定了重要基础,推动动物叙事从题材的初步探索,逐步走向叙事本体论的建构与深化。

在空间诗学的具体建构中,动物常作为核心符号,承担起激活地理记忆、转换空间意义的重要功

能。张承志的《黑骏马》正是这一路径的典范之作。黑骏马“刚嘎·哈拉”不仅是一匹坐骑,更是蒙古草原精神的鲜活象征;其奔腾的身影串联起草原民族的生存图景与历史脉络,使草原超越纯粹的自然地理范畴,升华为一个融野性、灵性与悲剧性于一体的文化场域。通过黑骏马与主人公白音宝力格之间深刻的生命联结,张承志不仅书写出游牧文明的生命伦理,也借助这一空间化的叙事,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精神断裂展开深切反思。这样一种植根于民族生存实感、勇于直面文化危机的写作姿态,体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也彰显了一个作家的“时代的良心、社会的良心”^[17]。与之呼应,乌热尔图的创作则锚定于鄂温克族赖以生存的森林空间。他笔下的“鹿”意象与森林生态系统血脉相连,使森林成为充满伦理张力的对话场域,承载起民族命运与生态危机的双重隐喻。

进入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作家在空间诗学的探索中进一步丰富了动物叙事的内涵。他们在延续将动物与地域紧密结合的叙事传统的同时,更加注重从特定空间中萃取地方性知识,使动物意象具备深厚的文化阐释力。例如,阿来笔下的嘉绒藏区中,鹰、蛇、猴等动物不仅是自然生灵,更是破译当地生态智慧与信仰观念的文化符号;石舒清则通过西海固乡村中人与牛羊共处的仪式化场景,展现出回族“敬畏生命”“两世并重”的伦理观如何深植于乡土日常。这些作品生动地表明,不同民族依据其生存环境与文化传统,形成了与动物相处的独特模式及情感结构。正如王红所言:“由于各民族对动物的认识、与动物的关系、与动物的感情不同,在后现代这个开放的语境里,各种文化碰撞、整合、交融的趋势也能在动物叙事型的民族文学里找寻。”^[18]动物叙事通过激活地方性知识,成功地将地理空间转化为一种承载民族伦理与生态思想的诗意场域,同时在全球化语境下开辟出多元文化对话的审美路径。由此可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凭借其独特的空间诗学,实现了从地理空间向意义世界的本体论升华。在这一过程中,动物意象作为关键媒介,将原本具象的地理空间升华为融合民族记忆、伦理观念与地方知识的文化场域。这种基于空间的叙事建构,不仅拓展了文学的表现维度,更深化了我们对民族认同、文化传承与生态关系的理解。

石舒清的创作为“空间诗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个案。他将叙事空间深深扎根于宁夏西海固的乡村院落与黄土沟壑之间,凭借独特的

审美经验与深厚的情感积淀,将动物叙事、地域景观与回族信仰有机融合,构建出一个意蕴丰厚且充满灵性光辉的伦理世界。石舒清尤其擅长从日常家畜切入叙事,通过牛、羊等平凡的动物意象,生动展现回民群体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坚守的宗教信仰与民族精神。在其笔下,动物常被赋予类人的情感与灵性,《清水里的刀子》中那头仿佛能预知命运、从容赴死的牛,以及《失踪的羊》中彰显母性牺牲精神的母羊,无不闪耀着动人的神性色彩。这种书写正是对回族文化中“敬畏生命”“两世吉庆”等伦理观的艺术实践。尤为重要的是,石舒清的创作始终以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层共性为基石,在“一体”中探寻“多元”的个性。作为一种内在的文化基因,中华文明始终在多元共生与交融互鉴的格局中延展,其强大的生命力正源于“和而不同”所赋予的包容性。其作品正是这一文化逻辑的生动体现,既刻画出西海固回回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又鲜明地映照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成为“和而不同”理念在当代文学场域中的深度实践。

从石舒清的创作实践延伸开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的空间诗学建构,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本体论意义。不同民族的作家都致力于将独特的地理空间转化为承载文化记忆与伦理观念的诗意场域。例如,次仁罗布的《放生羊》在拉萨街巷的日常场景中,构建起老人与羊之间超越物种的情感联结,使“放生”这一行为升华为生命救赎的象征;郭雪波的《银狐》则将蒙古族的图腾崇拜与独特的沙地空间相融合,通过人狐关系的嬗变,隐喻对现代生态危机的深切反思;而黑鹤在《黑狗哈拉诺亥》等作品中,依托草原或森林的自然背景,借助动物的命运轨迹,折射出草原文化的变迁与其内在的坚韧精神。这些创作共同表明,动物叙事正是通过对特定空间的诗意营造,将物理性的地理环境升华为深植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文化隐喻空间。

尤为深刻的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中反复出现的“最后一个”母题,实则是深层空间焦虑在文学中的集中表达。这一母题不仅承接了前文所述的空间诗学建构,更将其推向一个充满张力与自省的维度——它既是对文化传承境遇的关切,也是对变迁中文明图景的深沉写照。现代性所带来的生态剧变,不仅改变了自然地貌,也重塑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空间叙事逻辑。面对自然生态、社会结构乃至精神家园的多重瓦解,作家们通过动物叙事,构建起一套可称为“危机地理学”的表述体系。而“最后

一个”母题,正是其中空间焦虑最为凝练的象征表达。无论是郭雪波笔下的“最后一个孛”,乌热尔图故事中的“最后一个萨满”,还是《最后一只白虎》《红狐》等作品中描绘的“最后的猎人”与“仅存的猎物”,它们都指向特定文化空间及其所维系的生活方式正在经历的深刻转变。这些“最后一个”形象,如同一面面镜鉴,映照出特定地理场域与其所承载文化记忆的当代命运。

在这些叙事中,猎人与猎物的关系逐渐超越了传统的对抗模式,展现出在生存绝境中相互依存、共生的复杂图景。这一转变不仅是情节设计上的创新,更承载着在日益碎片化的生存空间中,人类尝试重建生命共同体的伦理探索。它体现了文学对“天人合一”这一传统空间观的现代呼应与创造性转化。“最后一个”的叙事模式,其意义已超越单一民族的文学表达,成为一个引发跨文化共鸣的母题。贾平凹、陈应松、杨志军、姜戎等汉族作家的笔下也涌现出类似的主题,说明这种空间焦虑并非某一民族所独有,而是现代性困境所引发的普遍回响。当不同文化背景的写作不约而同地回归“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时,它们共同揭示出现代性危机的深层根源。人类在对自然的征服中,既破坏了生态的平衡,也切断了自身与精神根基的联系。因此,这些“最后”的意象既承载着逝去文明的记忆留存,也寄托着精神重建的象征意义。它们推动文学叙事突破局部的生态关怀,深化为对现代文明路径的整体反思。

面对现代性所造成的“人与周围自然界、自我与他人、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破坏性断裂”^[19],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正尝试从这一断裂处出发,以文学的方式进行弥合与重建。阿来、乌热尔图、郭雪波等作家基于“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是相互关联的生命共同体”^[20]这一叙事立场,构建出既扎根于本土经验,又回应全球性生态关切的文学表达。阿来借助嘉绒藏区的动物传说,乌热尔图书写鄂温克族的森林记忆,郭雪波依托蒙古族的沙地图腾……他们分别从神话、记忆与图腾等维度,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能路径。这些创作表明,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创作手法,步入对文化内核与世界观的深度重构。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动物叙事进一步展现出本体论建构的深度与广度。少数民族作家积极开掘神话、史诗等传统文化资源,使作品在艺术质感与思想厚度上持续深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叙事通过对动物生命的伦理关

怀、对人性良知的唤醒,以及对理想民族性格的塑造,实现了从美学实践向伦理实践的内在跨越。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所构建的空间诗学,本质上是一种立足于地方性知识、生态智慧与民族记忆的本体论重建。它一方面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意义丰厚的文化场域,为疗愈现代性断裂提供独特的文学方案;另一方面也借助“最后一个”等叙事母题,推动“天人合一”的传统空间观实现现代性转化。在新时代思想资源的滋养下,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投身这一叙事传统,积极汲取神话、史诗与民间文化的养分,推动作品在艺术表达与思想内涵上不断深化,逐渐形成成熟的小说样态。这些创作不仅限于题材与技法层面的创新,更指向一种深刻的本体论重建,其核心体现为对动物生命伦理的关怀、对人性良知的呼唤,以及对理想民族性格的追寻。作家们以多样化的文体形式与叙事立场,传递出深厚的人文精神与自省意识,使“空间诗学”由美学实践升华为伦理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动物叙事既与动物权利思潮展开对话,也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语境中进行文化博弈,致力于重塑那种“不可化简的多重的、错综复杂的”^[21]人与动物关系。由此,动物叙事已从一种文学表达,演进为巩固民族认同、重构生态伦理的重要文化路径。它不仅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与生态人文精神的重铸注入活力,也凭借对“地方性知识”的创造性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

四、文明启示:民族主体性介入全球生态话语的路径

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既是对特定地域经验的诗性书写,也为民族主体性介入全球生态话语提供了重要路径,其演进过程清晰呈现出从民族叙事到生态共同体的“本体论构建”轨迹。“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带来中国广大乡土社会的剧烈变迁,也引起了边地世界的剧烈变迁,不过,它有自己的重心,即主要围绕边地书写的现实层面和民族国家的命题思考而展开”^[22],在此背景下,以阿来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作家,以其深沉的民族志视野,将动物叙事作为批判性观察与反思现代性影响的文化透镜。无论是机村恶化的生态环境、措娜温泉的变迁,还是云中村悄然消逝的兰草,这些生态创伤符号在阿来笔下从揭示自然资源被掠夺的现实后果,深入至折射人文精神所遭遇的深层困境,从而展现出少数民

族作家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文化自觉与精神坚守。

进入21世纪,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与社会变迁的深化,当代民族文学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它需要“善于观察、研究各民族在高度现代化、变化层出不穷的今天碰到的新情况、新现实,书写基于这种新情况、新现实而产生的‘新故事’”^[23]。在这一要求下,民族文学立足时代前沿,紧扣社会发展的脉搏,对一系列核心议题展开持续而深入的探索。作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类型,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的表达疆域也在这一进程中显著拓宽。它已不再局限于个体生存或人类生命的单一维度,而是逐步延伸至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与伦理视域,触及生态、种群、民族、信仰、家园与文明等一系列核心命题。更为关键的是,其叙事伦理实现了从对生态破坏的表层揭示,向对现代性逻辑本身的深度诘问的转变,从而在文明反思的层面获得了更普遍的对话能力。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动物形象也超越了以往作为情节要素或文化象征的传统角色,逐渐成为连接传统信仰与现代生存经验的伦理中介,推动叙事从“地方性知识”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哲学思考。

从郭雪波笔下穿越科尔沁沙地的苍狼,到乌热尔图森林故事中通灵的驼鹿;从李传锋白虎图腾里蕴藏的土家族文化密码,到阿来作品中红狐映照的藏地文明与现代性碰撞的阵痛;再到满都麦笔下见证草原伦理变迁的牧羊犬,叶广岑秦岭叙事中虎啸发出的生态警示……在物种灭绝与文化消逝的双重危机下,动物形象所构筑的符号体系,已升华为民族精神的具象载体,其意涵关涉物种存续、自然与人文生态的平衡、人类精神原乡、原始宗教信仰以及民族文化认同等多重维度。在此语境中,“民族视域”作为一种方法论,应持续引导我们对“动物叙事”展开深入的解读与阐发。具体而言,这一路径包括:探析本土叙事要素,考察民族叙事本土化的具体手法,如写作技法、修辞策略、情节模式与结构艺术等;推动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汲取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智慧与创作元素;并在类型学视野下进行体系建构,通过共时性文本分析,归纳出民族文学动物叙事的本土语法与主导叙述品格。这种方法论的自觉,不仅有助于避免民族主体性沦为封闭的自我言说,也能在与更广阔的知识体系和叙事传统对话中,确立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展现出丰富而多元的书写图景,以鲜明的地域实践勾勒出独特的发展

路径。李传锋以鄂西南白虎图腾为核心,将土家族巫傩文化与现代性困境相融合,编织出意蕴深沉的文化寓言;赵剑平扎根黔北喀斯特山区,描绘山民与野兽在农耕文明变迁中的命运交织;郭雪波依托萨满教视野,将科尔沁草原上的生灵塑造为生态寓言的主角,见证游牧文明的式微与自然生态的危机;叶广岑在秦岭深处重建虎啸猿啼的生态诗学;黑鹤则把呼伦贝尔草原的驯鹿文明转化为游牧精神的当代载体。这些作品在动物与文明的交织叙事中,构建出具有文化人类学深度的叙事范式。它们共同揭示出:民族主体性的真正确立,是通过深耕地方性知识,将其转化为能够参与全球对话的叙事资源,从而在生态、现代性等人类共同议题上发出独特而有力的声音。

由此,研究视角可进一步延伸至文化自觉与原生态书写的领域,在跨文化对话的动态框架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不仅能够作为参照系与西方动物书写展开对话,更在比较诗学的视野中,凸显二者在生态伦理观照与叙事策略上的互文关系。例如,劳伦斯《羽蛇》中的图腾叙事与黑鹤笔下的萨满视角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而吉卜林《丛林之书》所隐含的殖民寓言也与阿来对现代性的在地反思构成意味深长的对照。这类比较超越了对不同叙事价值优劣的简单衡量,其核心在于激活不同动物符号系统之间的对话,揭示生态思考的多元路径,进而在差异与互补中拓展全球生态批评的认知图景。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动物叙事的独特价值,在于其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叙事动能与美学力量,这也正是其“本体论构建”的核心所在。在方法论层面,作家通过动物符号唤醒民族集体记忆,逐步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叙事语法;在审美层面,他们融汇佛教的众生平等、道教的物我齐一等传统哲学资源,与深层生态学展开对话,推动“天人合一”等理念实现现代转化。这样的叙事实践,不仅是一种美学创造,也是参与全球生态话语建构的重要方式,旨在塑造一种新的生态共同体想象,为“人类世”的生存困境寻找精神出路。最终,这类写作超越了题材与技巧层面,回归到“为何写作”的本体论命题。在技术理性日益主导的时代,它试图通过叙事重新连接人与万物,为人类寻回基于生命共同体的、谦卑而深沉的伦理情感与精神归属。

综上所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本体论的确立,呈现为一个从情感基质到空间表达、再到文明对话的动态过程。这一进程以图腾原型为精神起

点,经由空间诗学的在地化实践,最终在文明层面实现了民族主体性对全球生态话语的积极介入。它不只是一种文学表达方式,更是一种根植于民族传统、回应现代性危机并参与人类共同议题的文化实践。该叙事范式以“生命一体化”的古老智慧为哲学基础,通过将地方性知识创造性地转化为生态批评资源,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成规,为全球生态危机的反思贡献了独特的东方视角与文明智慧。面对物种消逝与文化变迁的双重挑战,这一立足于“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叙事本体论,凭借其深厚的地方经验、深沉的生态关怀与鲜明的民族精神,为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文明启示。其发展轨迹表明,民族文学唯有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积极回应人类共同命运,才能实现从地域书写到世界对话的跨越。随着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少数民族文学动物叙事必将在世界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图景中镌刻下清晰而深刻的东方印记。

参考文献

- [1] 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1.
- [2] 朱宝荣.动物形象:小说研究中不应忽视的一隅[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1):115-121.
- [3] Simmons L, Armstrong P. Knowing Animals[M]. Leiden; Boston: Brill, 2007:1.
- [4] 钱永祥.人性的镜子:动物伦理14讲[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4:19.
- [5] 张伟.远行之瞩[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198-199.
-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1.

- [7] 段燕.他者·他性·他我:当代新英语小说中的动物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2.
- [8] 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1.
- [9] 陈佳冀.中国当代“动物叙事”神话原型母题及其模式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08-116.
- [10]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M].文良文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4.
- [11] 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05.
- [12] 杨玉梅.生命意识与文化情怀:郭雪波访谈[N].文艺报,2010-07-05(5).
- [13] 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M].隗仁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8.
- [14] 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84.
- [15] 孙悦.动物小说:人类的绿色凝思[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40.
- [16] 海勒根那.“作家现在时”海勒根那访谈[J].小说月报,2022(8):封面页2.
- [17] 王喜绒.生态批评视域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44.
- [18] 王红.复调与重弹:当代民族文学的动物叙事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07(6):219-222.
- [19] 斯普瑞特奈克.真实之复兴:极度现代的世界中的身体、自然和地方[M].张妮妮,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6.
- [20] 张亚婷.中世纪英国动物叙事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225-226.
- [21] 卡勒.当今的文学理论[J].外国文学评论,2012(4):49-62.
- [22] 赵顺宏,卜梦怡.论当代汉语边地小说的审美发生[J].浙江学刊,2024(1):182-190.
- [23] 鲁太光.以时代精神激活民族文艺[J].中国文艺评论,2023(7):36-47.

The Ontological Turn and Civilizational Insights of Animal Narratives in Contemporary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Chen Jiaji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ecological crises and civilizational dialogue, animal narrativ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are undergoing an ontological turn from ethnic allegory to ecological community. Centered on the works of writers such as Ureltu, A Lai, Guo Xuebo, and Shi Shuqing, these narratives transcend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using animals as metaphorical tools through ethnographic writing, the translation of totemic symbol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ographical spaces. By engaging in a dialogue between Western animal rights theory and the Eastern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all life”, they construct a narrative ontology that transcends anthropocentrism. The study reveals that animal narratives not only reflect the collective psychological archetypes and cultural memories of ethnic groups but also transform local knowledge into local resources for ecological criticism through “spatial poetics”. Rooted in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Tian-Ren He-Yi”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this narrative practice, with its modern reflections centered on the motif of “the last one”, serves as both a literary response to ecological crises and a unique way for the subjectivity of ethnic narratives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ecological discourse. It provides profound civilizational insights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community of life where humans and nature coexist.

Key words: minority literature; animal narratives; ontological turn; community of life; ethnic subjectivity

责任编辑:知 然